



彭德怀挥师西北鏖战“马家军” (五)

1949年5月18日，国民党行政院明令宣布马步芳代理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率领自己的一套班底从西宁赶到兰州上任，原长官公署的要员几乎全被撤换，只留下桂系的副长官兼参谋长刘任等人。马步芳还故意留下郭寄嶠，以抵制马鸿逵，等时机成熟再逼他让位。与此同时，马步芳还发动各地大肆献马献旗，派代表来兰州祝贺，为自己大造声势，完全把马鸿逵摺到一边。

马鸿逵在兰州左等右盼，也不见马步芳举自己当甘肃省主席，一怒之下电令宁夏兵团后撤。此时，宁夏兵团近10万人由马继援指挥，正在进攻陕西，但由于二马交恶不和，彼此无法协同行动。马继援在进军时，故意把宁夏兵团摆到正面第一线，而宁夏兵团则只听命于马鸿逵，对马步芳父亲的命令根本不理。这样，宁青联合兵团进攻陕西很快遭到失败，两部争相往后撤退。青海兵团撤退在先，想截住宁夏兵团退路。但宁夏兵团一夜猛冲，冲过了马继援的警戒线。

马鸿逵当不成甘肃省主席，心里感到很气愤，又无从发泄，还是最得专宠的四姨太刘慕侠给他出了主意，趁马步芳暂回西宁之机，到广州面见李代总统。马鸿逵到了广州，见到李宗仁，但李宗仁并不支持他，想飞往台湾见蒋介石，但李宗仁又不肯批准，马鸿逵唯有再电令宁夏兵团继续后撤。

此时解放军西野30万大军，经过扶眉战役和陇东追击战后，在彭德怀率领下，向着西北挺进。马步芳闻知解放军进军西北的消息后，便急令其82军骑兵第14旅、129军骑兵第8旅集结于固关、关山岭、马鹿镇一线，企图阻

止解放军西进。固关位于陇县西北60公里的陕甘交界处，是通往甘肃的第一道大门。这里，四面高山耸立，沟壑纵横，唯一的一条公路夹在狭长的山谷之中，易守难攻。马步芳以为，凭借这道关隘，就可以把西野拒之于甘肃门外。但西野第一兵团王震部没有辜负彭德怀的期望，经过一番恶战，西野拿下了固关，被马步芳吹嘘为“精锐铁骑”的“马家军”第14旅被悉数歼灭。

攻下固关后，解放军士气大振，而“二马”却仍矛盾重重，宁夏兵团置青海兵团于不顾，不断后撤，彭德怀遂乘势挥师相继攻取武、泾川、平凉等军事重镇。针对这种局势，李宗仁、阎锡山经商议认为，西北只有“二马”还有点力量，不笼络住马鸿逵，马步芳的势力更孤立，于是决定让马鸿逵当甘肃省政府主席。马鸿逵得知这消息十分高兴，即去电次子、宁夏兵团司令长官马敦静，第81军军长马敦靖(马鸿逵之子)，以及128军军长、宁青兵团副指挥官卢忠良等，要其死守住宁夏的门户固原和瓦亭，为自己争回面子。然而，就在8月1日马鸿逵正式被任命为甘肃省主席的当天，宁夏兵团及各部阵地相继被解放军摧毁，卢忠良下令全军后撤，向宁夏溃逃。西野部队在彭德怀率领下，疾速向西挺进，兵锋直指兰州。

李宗仁、阎锡山为消除“二马”之间的对立情绪，挽救西北危局，电召马步芳到广州，与马鸿逵见面，又请出马全钦(马占鳌孙、马安良之子)从中说和调解。“二马”因解放军大兵压境，处境相同，因而表面上又言归于好，甚至还抱上古兰经发誓，要同生死，共患难，并商定次日一起乘飞机回兰州。

到晚上，马鸿逵即后悔，担心跟马步芳去了兰州，会被当作人质扣起，所以第二天他不顾马全钦的劝阻，坐飞机直飞回宁夏。

五

兰州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当时，它不仅在地形上是扼制青海、甘肃河西走廊、新疆及宁夏的枢纽，也是国民党反动统治在西北的军事和政治中心。

刚刚当上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的马步芳，并没把解放军放在眼里，他想，凭着兰州依山临水的地形和抗战时期的国防工事，城内驻守的主力82军和129军，城外左有91军和120军，右有新编的骑兵军和保安团，共计10万大军，彭德怀的土枪土炮，是打不下兰州的。但马步芳也知道，兰州决战将是生死存亡的关键一仗，打得好，吃掉彭德怀的西野，他将在西北站稳脚跟；打得不好的，兰州一破，青海、宁夏将会随之完蛋。因此，他对兰州城防还是进行了认真的准备，每天带人检查工事，储备了充足的粮草弹药，准备与解放军决一死战。在随后召开的紧急军事会议上，马步芳还提出了“破产保产，拼命保命，挽救危机，确保西北”的口号，但会后，马步芳却将固守兰州的重任交给马继援，离开兰州回到了老巢西宁。在离开兰州之前，他还下令宁夏的马鸿逵，令其率部增援兰州。

马鸿逵看到彭德怀大军即将兵临兰州城下，他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一旦兰州失守，接下来彭德怀要对付的就是他了，局势一旦发展到这个地步，胜负结果不言而喻。马鸿逵深知兰州战役的成败，也将决定自己的命运，便

将其与马步芳的恩怨暂且放下，他集结主力，摆出支援青马的姿态，企图等待有利时机，出兵攻击解放军侧后。

马鸿逵将所有的保安部总队、保安师加以改编，统统隶属于正规军，这样，在原来两个军的基础上硬是挤出了一个“贺兰军”，由马全良率领进驻宁甘边境，做出驰援兰州的迹象。不过，就是在此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老奸巨猾的马鸿逵算盘打得十分精细，他对马敦静面授机宜：“可令卢忠良第128军佯援兰州，嘴上不妨叫响点。至于何时出兵动真格的，待兰州战局之发展再定吧！”

马继援接手固守兰州的重任后，很快便做好了兰州的战役防守计划：以其战斗力最强的第82军和第129军两个主力军等部，共5万人据守兰州；以第1军、第120军，以及马鸿逵的第81军共2万余人为左翼，于靖远、景泰沿黄河及打拉池地区防御；以新成立的骑兵军共2万人作为右翼，控制临洮、洮沙地区。马继援对解放军城防工事，并不将彭德怀放在眼里，竟大言不惭地对部下说道：“我要大胜兰州，尔尔一举拿下西安，杀出潼关，平定中原，占领全国，让马家掌天下！”

马继援的大话传到了彭德怀的耳中，彭德怀淡然一笑：“我倒是觉得此人很天真。天真不是什么坏事，但打仗靠天真可不行。”得知马继援固守兰州的消息后，彭德怀对指挥部成员说：“我就是怕他跑掉，他不跑，守在兰州，我们就有办法了嘛！打马家军是硬任务，尤其是青马，困难再大也要打，这是解放西北人民的第一步！”(未完待续)

(据银川党史网)

抗美援朝时期宁夏的拥军优抚 (上)

抗美援朝时期，全国各族人民响应党和政府号召，热情地优待照顾志愿军家属，妥善安置伤残军人，踊跃支援前线。拥军优抚运动的成功开展，极大地鼓舞了前线志愿军将士的斗志，调动了他们奋勇杀敌的爱国热情，稳定了后方军人的家属，宣传动员后方各阶层人民支援抗战，作出积极贡献。

1951年，中国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了“三大爱国号召”后，拥军优抚就作为当时一项中心工作在宁夏展开。

赴朝慰问志愿军及朝鲜军民

中国人民第一、二、三届赴朝慰问团赴朝鲜慰问志愿军及朝鲜军民，宁夏人民均派遣代表参加。每次慰问后，都认真地向全省各族各界人民进行规模盛大的传达报告活动。每逢重大节日，各地均组织慰问团慰问当地驻军伤病员，并定期招待伤病员看电影。驻军也分别召开军民联欢会，邀请群众参观部队生活，给群众担水、扫院，充分体现了“军

爱民、拥军”的团结友爱精神。

馆藏档案《全国人民慰问团赴朝慰问团第二总分团第五分团总结报告》(1954年)，对慰问情况进行了描述：慰问团由第二总分团副团长、第五分团副团长、第二总分团代表、第五分团代表和第三分团赴朝慰问团代表组成，连同文工团及工作人员共379人。

慰问团分四个小组进行慰问。第一小组慰问银川市附近部队后，前往永宁、新城和阿旗进行慰问。历时22天，慰问了11个单位。第二小组由银川出发，经过平罗、惠农、贺兰、陶乐等县。历时22天，慰问14个单位。第三小组前往宁朔、中卫、同心、中宁四县。历时21天，慰问12个单位。第四小组慰问地区：金积、吴忠、灵武、盐池、定边、靖边。

慰问团进行慰问活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一般除召开慰问大会、报告会、单位座谈会、功模座谈会外，还采取了访问、个别接触以及小型演出等方式，深入班、排、病房、厨房、宿舍、饲养班、司机班进行慰问，基本上做到了人

人见面。慰问团在各地共召开慰问大会25次，报告会21次，单位座谈会43次，功模座谈会13次，参加人数共计13万人以上。慰问团还组织了歌舞、清唱等共计231场，观众约25万人以上。

慰问团向战士们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和全国人民对他们的关怀和热爱，报告了祖国四年来在经济建设方面的伟大成就以及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同时，第三届赴朝慰问团的代表们还传达了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前线的英勇事迹。

通过慰问，给了部队很大的教育，使战士们认识了当一个人人民战士的光荣，增强了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提高了斗志，增加了保卫祖国建设的决心。

做好全省军烈属的优抚工作

西北军政委员会《对抗援随军服勤家庭优待指示》，宁夏省委发文《省委关于优待军人的几项具体规定的通知》，对开展优抚工作进行了明确规定。

宁夏省共有烈、军、工属12152户，占全省总户数的6.25%。人数78499人，占全省总人口的8.33%。拥有土地294829亩，占全省总面积的6.6%。(注：统计数据截至1952年)

宁夏省拥军优抚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获得了显著成绩，优待烈、军属和复员转业军人已成为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日常工作，所有烈、军属和复员转业军人普遍受到政治上和物质上的优待。在农村采取了“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建立家务”的办法，在城市则采取了“组织生产、介绍职业”的办法，帮助解决生活和生产问题。每逢年节，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给烈、军属拜年、祝贺、庆功、送礼、挂光荣灯光彩匾、送领袖像、请吃饭，看戏看电影并设光荣桌。公私商店减价优待，医院免费治疗。大大提高了烈、军属的政治地位，树立起尊敬烈、军属的社会风气。物质生活上，根据烈、军属生产和生活状况适时予以解决。

(据宁夏档案微信公众号)

这里也是被“红色”染过的土地 (上)

——宁夏海原县革命遗迹寻踪

纪念建党百年、传承红色基因，全国各地兴起了探寻红色遗迹的热潮，以往许多很少被人关注、外界了解也较少的红色遗迹，因此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在宁夏，一提到红色遗迹，人们就会想到工农红军长征经过的六盘山、单家集、将台堡和我党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权的诞生地同心县，而对其他地方的历史事件和红色遗迹却所知甚少。

其实，除了上面提到的地方之外，宁夏还有不少被“红色”染过的土地，那里不仅发生过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而且留下了重要的革命遗迹。其中，与同心县、西吉县接壤的海原县，就是一个革命活动较多、红色遗迹也较多的地方。

有资料显示，早在1932年，中国共产党在海原县就有活动

了，陕甘工农红军在谢子长等人的领导下，曾在海原及周边地区坚持了4个多月的革命斗争。1936年10月9日和10月22日，红一方面军先后在甘肃的会宁、宁夏西吉县的将台堡分别与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会师，从而结束了伟大的长征，这也成为我党我军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三个方面军根据中央的指示继续北上，进入海原县境内。11月1日，红军三大主力先后移师海原县的关桥堡，三大主力的首长首次相聚并共同参加了史称“关桥堡会商”的关桥堡军事会议，朱德、贺龙、任弼时、邓小平和张国焘等三大主力的重要领导人都参加了这个会议，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三军会师”(有专家认为甘肃会宁会师和宁夏将台堡会师都是两个方

面军的会师，还不是三个方面军的“完全”会师)。

党史上有名的“贺家堡会议”在当年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的临时驻地贺家堡举行。贺家堡，距海原县城有12公里，面积有6700平方米，是当地土绅李文学修筑的庄园。在现场，我看到贺家堡目前保存状况依然完好，院墙高达6米、宽约3米，院墙四个角都设有哨位，墙外四周还有5米宽的护城河。院墙全部是用黄土夯筑，只有堡门是用砖砌成的。堡门前面，有2016年立起的标志牌，上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临时驻地”“贺家堡会议会址”。但这里还不是文物保护单位。此外，堡门前还有近期挂起的横幅，上书“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12个大字。堡内，

除了几间房屋外，还栽植了大量的果树，房屋内虽然摆放着许多生活用品，但已经没有人居住了。1936年11月1日，贺龙、任弼时等率领的红二方面军移师至此，就将总指挥部设在堡内。第二天，朱德也来到这里，当晚也留宿于此。随后，他又主持召开干部会议，部署“关桥堡伏敌计划”。

期间，林育容(张浩)受毛泽东委派，以共产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到贺家堡约谈张国焘，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打消了张国焘的思想疑虑，顺利地解除了他在红四方面军的军事指挥权，进而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军事指挥权的统一，这在军事上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贺家堡的历史地位，也因此凸现出来。

(据宁夏档案微信公众号)

移民岁月 第七十六期

支援宁夏 无怨无悔(五)

——宁夏卫生学校上海支宁教师马洪达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马洪达：1957年，全国开展向党交心活动，那时候我也在积极要求入党，就主动把解放前的一段经历给组织上汇报了，在我们住的村子里被动地当了一个月保长，也是日本人占领时期，每个村子都要选出保长。保长是没人愿意干的活，因为我识字，就逼迫我去干，一共干了20多天，我发现不能再干了，因为日本人天天逼着我到乡亲们家里收粮收捐。当时老百姓已经穷了，再去天天逼着收钱肯定是要得罪乡亲们的，所以20多天我就跑掉了，不干了。这段经历档案里也没有记录，大家也不知道，但我想要向党交心，就给党交代了。这下坏了，组织怀疑我加入三青团，最后还派人外调，乡亲们对我的评价很好，这事才结束。但到了文革时期这事又被翻了出来，一定要我交代打了多少人、欺压了多少老百姓，我真是有口难辩，过了一段时间，最后又不了了之。

1958年，马洪达实现了当一名人民教师的愿望。这年他正式走上讲台，主讲化学课和化验课，随后学校又开设临床检验课，他又成为唯一的主讲老师。大跃进时期，全国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学校针对宁夏寄生虫病人较多的现状，开设人体寄生虫学检验课，这是一门专业性和针对性很强的课程，没有统一的教材，没有实验室，没有检验标本，一切从零开始，这些都难不住马洪达，他日夜学习，自编教材，并在宁夏人民医院检验科、北京卫校检验科和北大附属医院的全力支持下，解决了实验用标本问题，使这门新开的课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教学效果好，学校就会压担子，本来是一个学业班有两个班，又新增临床检验课。只要与检验有关的课程，全是马洪达一人带，还不时为党校翻译外文资料。他形象地告诉我们，那几年走路都必须小跑，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每天都在繁忙和快乐中度过。

马洪达：我们报名支援边疆时都抱着一颗爱国之心，有很强烈的光荣感和自豪感。来到宁夏后尽管遇到了一些不太顺心的事，但最后都搞清楚了，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宁夏对我们很好，给我们很多施展才干的舞台，所以我总想着把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更多地献给宁夏。再加上我懂英语，不仅我们学校的英文资料要让我来翻译，宁夏人民医院的外文刊物也找我翻译，还有新开的课程要编写教材，我就刻板自己印，讲课时还要理论联系实际，融入很多故事，让学生爱听、容易记，并能很快应用到实际工作中。我在卫校讲的课有一半是新开的课程，因为当时宁夏搞卫生检验的人太少，1960年上半年，学校决定让两个检验班提前毕业，各门课程都给专业课让路，每天上午下午各四节课，晚上还要辅导1个小时的晚自习，经常是夜里一两点才下班，血液生化剂的配制要6个小时以上，必须晚上做，天亮后才能完成，常常是上课铃响了后饿着肚子直接上讲台，后来学生们知道了我的工作情况，写出大红表扬信贴在校门口，引起全校轰动。

上世纪60年代初马洪达的快乐很多：得到领导的认可让他快乐，学生爱听他的课让他快乐，同事赞誉他编写的教材让他快乐，外单位领导赞赏他的才华、请他去帮助翻译文献让他快乐。不快乐的事情也有，就是低标准的定量太低，吃不饱肚子，但即使因饥饿引起过浮肿也从没耽误过工作，宁夏几乎所有医院都有他培养过的学生，并成为检验行业的骨干，这让他最欣慰。有同事说：马洪达一直在向新的教学领域冲锋，一直在与时间赛跑，在冲锋与赛跑中马洪达的工作可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这期间他很快乐。他的工作进入了黄金期。(简银生 王旭阳 整理)

我就相信，胸前的这枚党徽(一)

——记宁夏农垦老战士许青培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许青培。

一位老人的胸前经常戴着一枚闪闪发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的形象，时时在我脑海闪现，我与这位老人的对话也时时在我耳旁响起。我曾好奇地问：“大爷，离休几十年了，怎么还戴这个？”

大爷嗓音洪亮地回答：“我就信这个！”说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不由得使我对这位长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钦佩。这样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怎么有着对党坚定的信念和对党执着的追求？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下，去追寻老人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脚步，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在追寻这位老人足迹的时候，惊闻老人已于2019年3月2日去世，在去世前夕，他向儿女们交代了四件事。一是代他再向敬爱的党组织缴纳最后一笔1万元党费；二是一旦病危不要让他大夫抢救了；三是丧事一定要从简，不能收任何人的钱物；四是一定要照顾好母亲。他去世后，儿女们都一一照办，实现了他对党忠诚、永远跟党走、家庭和和睦睦的遗愿。这位老人就是许青培。

1928年9月，许青培出生在山西省灵石县一个小山村。他虽然是独生子，但小学毕业后，仍旧外出寻求生活的出路，几经误入歧途。他耳闻目睹到国民党反动军队的祸国殃民和腐败无能，就积极寻求光明和出路，直到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解放太原的同时，他参加了解放军，找到了一条光明大道。

许青培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解放了宁夏，并担任十九兵团教导大队区队长，后被所在的部队派往新改编的西北独立第二军任职。1951年初的一天，他坐在准备开拔抗美援朝的汽车上，又被部队领导从汽车上叫了下来。部队领导说，“你是独生子，就不去朝鲜了，执行命令！”短短一句话，让许青培浮想联翩、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在国民党阎锡山部队里，是一名学生娃娃兵，从来没有因为独生子不让他当兵。在解放太原的时候，他投奔了共产党，共产党说，你是独生子，想回家我们给你发路费。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部队里，前后对比竟是天壤之别，这是许青培对共产党队伍的第一次认识。

许青培所在的西北独立第二军被整编为西北独立第一师，后改编为农业建设第一师后，开拔平罗地区的西大滩创建国营农场。

1952年5月，他被农建一师选派，参加河北芦台拖拉机训练班的学习。经过1年的学习，他成为一名宁夏农垦最早的农业机械方面的技术人员。

1950年1月，许青培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54年8月24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党。

许青培先后担任农建一师机务科科长，农建一师机耕队副队长，前进农场修理厂厂长，南梁农场党委副书记、副场长、党委书记兼场长，贺兰山农牧场党委书记、场长。

1990年9月，62岁的他光荣离休了。(祖宁平 马晓虎 整理)